

近代中國海軍發展中的海權認識

張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中國位處東亞大陸，瀕臨太平洋，不包括島嶼在內的大陸海岸線就長達 18,000 公里。如此優異的地理位置，原是開展海洋活動的良好條件；然而在其歷史上，除少數時期，如元代的海上貿易、明初鄭和率領船隊的遠航，政府少有積極的海上作為。十九世紀中葉西人憑藉先進的航海技術與性能優異的船艦，在東方尋求貿易機會和特殊權利，中國才不得不倉皇肆應。

1840 年的中英鴉片戰爭，清朝警覺到英人的入侵而有所準備，但最多只是加強傳統水師與沿岸防禦設施，匆促且不足的準備自然無法發揮禦敵效果。不過海防的意識開始逐漸受到朝野的重視。是時受命在廣東拒敵的欽差大臣林則徐 (1785-1850) 就提出了初步的海軍建設思想和應敵方法；他另囑託魏源 (1794-1857) 編纂《海國圖志》。此一巨著不僅介紹了當時所知的外國現況，也顯現魏源本人的海防思想。嚴格說來，此一時期的海防思想尚不足以稱之為海權觀念，但是當時的人對於海洋有了新的認識。其後十餘年間，西方列強依然憑恃海上武力威脅中國，清政府也終於自 1860 年起展開自強運動，並以追求船堅砲利為主要目標之一。

自強運動期間確實推動了海軍建設，包括人才的培育、艦艇的添購，及艦隊的組成。然而這些措施的着眼點仍是海防的考量，且由於清朝面臨內憂外患，海防與塞防何者優先，成為 1875 年朝廷內外大臣的辯論議題。清廷限於財力，最後也只能做出海

防、塞防二者並舉的決策。海防經費的不足，使得海軍建設難以落實。1884 年的中法甲申海戰和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說明了海軍建設成果有限。

此後數年，清廷不像以往那樣熱中於海軍建設。而在此時，美國海軍軍官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海權的著作，影響後世至鉅；西方國家和東亞日本的海軍力量持續增強。在此背景之中，中國重起爐灶，一步一步重建海軍，而馬漢海權論也被引進，成為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談論的議題之一。本文就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發展海軍的過程中，有關海權論述的形成與內涵，做一討論。

二、清末海權思想的發軔

根據近人研究，1885 年刊印，由駐德公使李鳳苞（1834-1887）節譯的奧國普蘭海軍軍官學校教習阿達爾美阿所著《海戰新義》一書，中有「凡海權最強者，能逼令弱國之兵船出戰」，這是「海權」一詞的首次出現。¹ 然而這句話並無更進一步的申論，似乎仍是強調弱國要藉海防，應付強國的挑戰。因此，「海權」一詞並未產生任何影響。到了 1898 年，出身福州船政學堂並曾留學英國學習海軍的嚴復（1854-1921），在其翻譯書籍的正文和按語中，開始使用「海權」一詞。如在〈擬上皇帝書〉中有「英之海權最大」之句，此文目的是勸說光緒皇帝出國考察訪問，學習西方國家，變法圖強。文中介紹英、俄締造海權的情況。他另在《原富》和《法意》兩本譯著中，也多次使用「海權」一詞。在《法意》的按語中，有「往讀美人馬翰所著海權論諸書」，故而論者指出嚴復在戊戌變法前夕，已有清晰的近代海權意識，並在開始翻譯《法意》時更加深化，且逐漸形成有系統的海權思想。由於《法意》是在 1907 年以前翻譯，故推斷嚴復在 1907 年以前接觸馬漢著作，更在 1908 年 9 月完成的〈代北洋大臣楊擬籌辦海軍奏稿〉之中，將之呈現。其所強調的海權，關係到國家的貧富、國防力量的強弱、國家的政治獨立。至於如何締造海權，自以規復海軍為中心，環繞於此者有配置船艦火砲、建設軍港、建設海

岸砲台等。²

嚴復此時使用海權一詞，顯示他個人對於 1890 年以來馬漢發表的有關海權的著作已有認識。不過馬漢的海權論真正傳入中國，却是 1900 年以後的事。1900 年 3 月，由日本乙未會主辦，而在上海出版發行的中文月刊《亞東時報》，開始連載日人劍潭釣徒譯自日文本的馬漢所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的緒言和第一章，但連載兩期即停刊。十年之後，由中國留日海軍學員創辦的《海軍》雜誌刊出了齊熙同樣譯自日文本的《海上權力之要素》，但因《海軍》雜誌存在時間短，故而馬漢的這本著作也只翻譯刊出少許。³ 此外，馬漢的另一部著作《海軍政藝通論》由吳振南在 1909 年翻譯出版。

這一時期正是所謂「甲午之後，吾國海軍日就退化，當時竟有將殘餘軍艦悉數出售之議，幸朝中老成，堅持不可。」⁴ 不過二十世紀初，清廷又開始籌議海軍。1905 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戴鴻慈（1853-1910）等上奏改革軍政，指出「歐美各國視海權與國權等重」，建請以五年為期，次第進行規復海軍。時任練兵處提調的姚錫光曾參與海軍要政，清廷認為他瞭解海軍規制，故命其擬制海軍復興計畫。1908 年姚錫光完成《籌海軍芻議》，該書序文中即指出「方今天下，一海權爭競劇烈之場耳」，清楚說明了世界各國所面對的挑戰，是無法逃避的。海權時代來臨，故「不能長驅遠海，即無能控扼海洋」「海軍與陸軍相表裡，我國海疆袤延七省，苟無海軍控制，則海權坐失，我陸軍亦運調不靈。」一反過去重視近岸防禦之海防論。他分「急就」和「分年」兩大辦法，前者就現有基礎作一整合，後者以「急就」方案實施後，繼續擴充海軍。他也強調，若是沒有遠航的能力，也就不能保證控制近海。這是把遠航的能力和海權的掌握聯繫在一起，因此他所建議的發展海軍方案，是要建立一支具有遠航能力的強大艦隊，過去以購置淺水兵船為主的建軍方向，他並不贊同。他的觀點反映了馬漢的海權思想。⁵

是時的海軍學術界有關海權的討論，似乎可以看出越來越受到馬漢海權觀點的影響。例如從軍事和經濟面闡釋海權之內容，以海外貿易的擴張來增強海上武力的發展；另外大致認同馬漢所

說的影響各國海權盛衰的六大因素：地理位置、海岸線、領土大小、人口數量、民族性格、政府的性質與執行的政策。更對海權影響國家盛衰的議題，表示贊同或加以引申。但對馬漢理論中的帝國主義擴張本質，尚未能提出批評。⁶而在清末籌議重建海軍者，大多會提出「海權」一詞，進而借助及應用馬漢海權論，說明中國海軍重建之迫切和方法。如留學生陳發檀(?-1944)於〈振興海軍呈〉中，指出「美國海軍將馬漢曰：一國之盛衰在制海權之得喪。」亦有人指出各國「無不擴張海權，故其國海軍不振者，其國勢亦不振。」⁷

晚清朝中人士和官派留學生開始談論海權，而領導推翻滿清革命運動的孫中山(1866-1925)，也逐漸掌握海權的意義。1906年12月他在東京《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的演說詞中闡述民生主義時，曾舉例提及「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⁸這可能是他首次使用海權一詞，但未進一步論述。其後，孫中山屢屢藉達爾文進化論「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觀點，意圖喚起民眾，注意國際間的競爭，以使中國勿受列強控制。例如，他指出「自世界大勢變遷，國力勝衰強弱，常在海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勝者，其國力常占優勝。」⁹這就將進化論應用在海權論述中，也因此成為孫中山海權認識的一項特色。¹⁰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競相發展海軍。戰爭期間，交戰國雙方運用海軍進行封鎖和反封鎖，意圖切斷敵國或維護本國的生命線，是為戰場上的重要作戰型態。戰後各國更是積極擴張海軍，孫中山對此一現象頗有警惕。他在為姚伯麟所著之《戰後太平洋問題》一書題序時，特別指出：

何謂太平洋問題？即世界之海權問題也。海權之競爭，由地中海移於大西洋，今則由大西洋而移於太平洋矣……今後之太平洋問題，則實關於我中華民族之生存，中華國家之運命。蓋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國也。爭太平洋之海權，即爭中國之門戶權耳。誰握此門戶，則有此堂奧，有此保障也。¹¹

孫中山相信海權盛衰關乎中國的興亡，也瞭解發展海軍與維護海

權關係密切。他對晚清追求船堅砲利的自強運動，並未將「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目標列入，認為是捨本逐末，以致造成甲午慘敗。到了民國，海軍力量薄弱，難以抵禦外侮。所以他確有把海軍建設放在國防建設首位的想法，也在《建國大綱》中的〈國防計畫書〉裡，列舉了五大部分20項目的海軍建設相關議題。此外，《實業計畫》的六大計畫，有三項是關於港口問題，顯示他對海洋事業的重視，試圖以建設近代化港口與發展航運業、造船業，來突出海權的經濟面。再以建設海軍，來突出海權的軍事面。¹²孫中山本人並未負責海軍的建設事業，不過以他居於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使其在清末民初陳述的海權觀念，經常受到後人的援引。

三、戰前建設海軍的海權基礎

民初紛亂的政局與軍閥的割據，使得北京政府的海軍建設陷於停滯，更無能力鞏固海權。1925年南方的國民政府展開北伐，一路進兵，初時並未憑藉海軍武力。到了1927年3月，隸屬北京政府的海軍在總司令楊樹莊(1882-1934)指令下，投向北伐軍，使得北伐軍隊得到海軍的助力。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伐軍事繼續進行，至12月28日奉系將領張學良(1901-2001)通電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的管轄，中華民國獲得了形式的統一。

北伐戰爭接近尾聲之時，國民政府對於未來有更多規劃的遠景。1928年7月18日北伐全軍總司令蔣中正(1887-1975)在北京大學向學生意講，期許中國能在十五年後建立一支足與世界任何國家抗衡的海陸軍。8月16日他又在上海參加江南造船所建造完成的「咸寧」軍艦下水典禮時，致詞期勉海軍官兵：「我們要挽回國家的權力，建設很大的海軍，建設我們中華民國成為世界上一等海軍國，全在諸位將士身上。我們預計十年後，就有六十萬噸的海軍，做了世界上的一等海軍國家。」¹³此後國民政府在南京的十年期間，主要擔負海軍建設重責大任的是海軍部長陳紹寬(1889-1969)。

陳紹寬於 1908 年畢業於江南水師學堂，清末民初的幾年間歷任幾種艦艇職務，由少尉逐級升至少校，並在 1915 年 12 月陳其美等革命黨人意圖奪取筆和軍艦時，率艦截擊，致使革命黨人之行動失敗，也使其在北洋政府海軍之中受到重視。其後赴美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北洋政府派遣數名陸海軍軍官赴歐洲戰場觀戰，陳紹寬為其中之一。他曾在日本、美國、英國停留甚長時間。在英國期間，也曾登上英國潛水艇隨同巡弋作戰。對戰時各國海軍的應敵措施和民眾的動員，有第一手的觀察，並完成九種報告，甚受海軍部的重視。戰爭結束後，他奉命留在英國，出任駐英使館武官，對於日、美、英三國於戰後大肆擴充海軍，感觸甚多。陳紹寬返國後仍在北洋政府海軍中任職，1926 年接任少將海軍艦隊司令，1927 年 3 月隨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投向革命軍陣營。1928 年 12 月出任國民政府新成立的海軍署署長，1929 年 6 月海軍署改為海軍部，陳紹寬為政務次長，實際代理部務，1932 年 2 月繼任海軍部長。

南京國民政府的建國十年，或稱之為黃金十年。由於地方軍系的勢力不時挑戰、剿共戰事持續不斷，以及日軍多次發動侵略，所謂建國也只能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海軍的遭遇亦是如此。當蔣中正提出建設海軍的構想時，自北京政府轉而投效革命陣營的海軍將領，都期待成立海軍部來推動海軍建設，但國民政府初時僅同意設立海軍署，獲得任命為署長的陳紹寬和其他幾位將領據理力爭，仍不獲重視。1929 年 1 月下旬，陳紹寬與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1883-1945）連袂辭職，此舉得到蔣中正的重視，極力慰留，二陳接受。4 月 12 日國民政府以海軍平定亂事有功，明令設立海軍部。¹⁴

然而中國的海軍本身也並未達到統一，東北和廣東均有附屬於地方軍事當局的海軍，蔣中正亦於 1933 年 3 月籌備成立雷電學校，發展「海軍中的黃埔」；但就實力而言，海軍部轄下的武力最具規模。陳紹寬對建設海軍確有一套想法，也能認真投入。為了使建設海軍的訴求更具說服力，陳紹寬在撰文或演講、談話之中，不時引述孫中山有關鞏固海防、發展海軍的言論，作為依據。他強調自己遵奉孫中山遺教，致力於實現三民主義，且「服

膺總理之難行易之遺訓，督率同人達有志竟成之目的，以致力於海軍之建設。」¹⁵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一講中，指出「無論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之能力，才能夠生存」，又在民族主義地五講中反覆申論世界各國海軍之比較，並提醒國人世上任何一國的海軍力量，都可能破中國之防禦，滅亡中國。¹⁶ 南京十年之內海軍新建完成的艦艇之中，有「民權」、「逸仙」、「民生」三艦之命名，可說是呼應孫中山重視海權的主張。

陳紹寬認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信要以海軍立國，有些國家還會標舉霸海政策，來作為整頓軍備的標準。美國在短時間內建設成海軍的一等國，中國的地勢和美國類似，都是半面濱海的國家，因此也「需要海軍來保護門戶，取得國際地位。」保護門戶是為海防，而海防之外，對於海面商船和國外僑商的保護，以及對於友邦的通聘，都用得著海軍。也就是這個原因，他認為要想建設海軍，就要有健全獨立的機關，所以他強烈主張成立海軍部。¹⁷ 此外，他感於「現在世界各國天天擴張海權，年年增添海軍噸數」，那是「因為海既是國境的邊界，海權被人侵占，比陸地被人侵削更厲害。」而「國家的強弱，全看領海權的比例。領海完全與否，全看海軍。十九世紀，所謂霸海政策者，就是海上競爭。如果海權能夠擴張，那麼工業商業才可制勝。因為有了海軍，則商船不致受人侵凌，盡可將我們的工商品運到他國，來交換貿易，吸收他國的金錢。」所以海軍是具有護商的能力，可以促使海權伸張，國家日臻富強。¹⁸

陳紹寬為了建設海軍，特於 1929 年 10 月派海軍上將杜錫珪（1874-1933）為考察歐美海軍專員，順道前往日本考察。考察團團員包括秘書董顯光（1887-1971）、海軍中校黃顯琪、少校程嶧賢、隨員高近辰、李宣韓。一行人歷訪日、美、英、法、德、意等國，至 1930 年 5 月返國，後完成《考察列強海軍報告書》。此書的結論即稱：「凡世上大國，不可不有海權，此一語幾可視為公例。蓋縱觀古今歷史，固未有能越此例者。」¹⁹

其他海軍人士也有一些相關的海權言論。如曾任海軍部常務次長的陳季良，是把廢除不平等條約當作發展海軍奮鬥的目標，亦即以武力作為外交的後盾，在他看來「若不積極地建設擴充海

上的實力一炮艦，國民革命的對外工作是很難成功的。」另一位同樣出任過海軍部常務次長的陳訓泳（1886-1944），亦是從保衛海疆，緊守國家門戶的觀點，來闡釋海權。²⁰

此時的海軍部另以出版期刊、年報方式，傳播海軍知識，宣揚海權觀念。主要是1928年5月創刊的《海軍期刊》，至1932年9月更名為《海軍雜誌》，一直發行到1945年年底停刊。這份期刊刊載了甚多與世界海軍現狀和歷史有關的文章，也介紹了與海軍有關的理論和學術。²¹馬漢有關海權著作的繼續翻譯，也是這一時期的特點。《海軍期刊》自第1卷第6期（1927年12月出版）開始，共分8期刊出唐寶鎬翻譯的《海上權力之要素》，將馬漢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核心部分有系統地引介。而曾留學日本獲得法學學士的林子貞，則從中國人的觀點，出版了《海上權力論》。該書共分七章，包括：一、海上權力的意思；二、海上權力與國防的關係；三、海上權力和陸上權力的比較；四、英國的海上權力；五、英國海上權力致大的要素；六、法國擴張海軍力的徑路；七、各國擴張海上權力的目的。對於最後一項，他列舉了10個方面，計有：伸張國勢、爭奪外國商業上的霸權、維持國勢的均衡、實施海外移民政策、開拓海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富源、保護工商業的利益、圖自國在海上貿易的安全、報復、報仇、保護獨立的主權等。²²

四、戰時困境中的海權構想

建國十年的海軍雖有些許的發展，但中國海軍的實力畢竟與已是海權強國的日本差距甚遠。1937年7月爆發了第二次中日戰爭，只有六萬噸排水量的中國海軍全數艦艇，面對超過二百萬噸且擁有新式裝備技術的日本海軍，無異於以卵擊石。中國海軍經過戰爭初期的奮力抵抗後，幾乎摧毀殆盡，國民政府則在1938年2月1日將海軍部改組為海軍總司令部，隸屬於軍事委員會，並跟隨政府遷至重慶。

由於中國沿海地區多為日軍佔領，海軍連海防的基本要求都無法達到，豈能奢談海權。然而海軍部原有的《海軍雜誌》依然

出刊，且在1940年4月，在湖南辰谿又創刊了一本綜合性雜誌《海軍整建》月刊，後來更名為《海軍建設》。《海軍整建》第1卷第6至8期刊載了淳于原彬翻譯的《海上權力之要素》。而自第1卷第11期起，又刊載了蔡臨冰所譯的《海權對歷史的影響》其他部份的譯文。另外介紹馬漢的文章，還有季震翻譯的〈馬罕海權論與第二次歐戰〉、王師復翻譯的〈馬漢海權觀在現在〉，均刊於《海軍建設月刊》第2卷第1期，1941年4月出版。²³

馬漢的海權理論雖然持續被介紹，但是海軍在抗日戰爭中未能發揮功效，又引起部分人士的質疑。其實早在1930年代前半，就已存在著一種「優空廢海」的言論，建議政府建設空軍，勿再耗資發展海軍。為此陳紹寬曾屢次發言辯護，說明海軍經費遠不如陸、空軍，且救國與應付國難，陸海空三軍不可偏廢。²⁴到了戰時，海軍處境更加惡劣，「優空國防」的議論再起，《海軍建設月刊》則刊出多篇反駁文章，強調不應忽視海軍建設。²⁵此一炒冷飯的爭論後來仍是不了了之。

對於海權的思考，抗戰前期的論者注意到一個新的切入點，即是國防線的問題。郭壽生指出，甲午戰前中國國防的外海防線是由朝鮮半島、濟州島、琉球群島、臺灣、澎湖群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團沙群島、海南島，和印度支那半島，所包圍著黃海、東海和南海，而形成的天然防衛。然而兩次中日戰爭的結果，破壞了外海防線。中國的內海防線則是沿海的重要港口和島嶼所構成，但是清末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割讓了香港，並使得外國在華擁有租借地。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後，整個海岸線完全被日人封鎖。所以此後中國的海防建設，一定要恢復甲午戰前的優勢，且必須在臺灣、海南島建立海軍根據地，才能保有海上的出路。²⁶另一位署名「老佛」的作者，則視北從庫頁島、南到南洋群島的島鍊，「為一條布幔，遮著大陸的整個海岸」，外人控制了島鍊，就使中國缺少了軍事掩護和發展經濟的海上自由，所以「中國國防的命脈不在本國的海岸，而是這條長鍊。」²⁷這樣的論述顯示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掌握海權觀點來表達收復臺灣的意圖。次年《海軍建設月刊》刊出「海權專號徵文啟事」，所列舉的徵文範圍包括：一、戰後中國在太平洋應有的地位，二、

中國海防之外線何在？內線何在？三、臺灣是我國海權的生命線，四、如何收復臺灣等海外失地並論如何保衛之，五、中國海權之遠景。²⁸ 可以看出此時臺灣在中國論述海權時，已開始佔有重要地位。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加入盟國共同對日作戰，幾乎已無艦艇的中國海軍在江中或海上作戰方面，自然起不了作用，然而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似乎未來的中國將在世界上扮演吃重的角色。中國逐漸以大國姿態面向世界，海軍也就嘗試換個角度來做未來建設的調整。

戰前的海軍部改組後，陳紹寬任海軍總司令，仍是國民政府海軍的領導人。他依然關心海軍的建設，且持續援引孫中山的言論，來支持他的訴求。隨著中國地位的改變，他的訴求也增加了新的論點。對內而言，他考慮到中國和外國簽訂平等新約之後，收回了江海的主權，外國軍艦行駛特權、內河航行權，和外籍引水人特權都將撤銷，那麼海軍就要更加擴充實力，加強設備，才能盡保護治安的艱鉅責任。²⁹ 到了戰時也才能把握住制海權。對國際而言，中國的地位提高，將會有更多處理國際事務的機會，且富有維持世界永久和平的責任。他認為：「我們既然是四強之一，那麼國際上的許多責任，我們也應該負擔著四分之一。我們要想擔負這四分之一的責任，我們一定要有國際全海軍力量的四分之一來使用，才能負起這四分之一的責任。」³⁰ 如果不能加強海軍實力，增進海軍艦艇噸數，則四強之一的地位將會有名無實，很難與其他大國並峙於世界之上。³¹ 陳紹寬依然有規劃戰後海軍的雄心壯志，然而此時的國民政府已有另外的建軍打算，陳紹寬的海軍生涯即將告一段落。

五、戰後復興海軍的海權論述

戰時重建海軍的理想看似遙不可及，但在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租借法案》應用於中國，故自 1942 年起，軍事委員會開始籌備選拔青年海軍軍官赴美國受訓，同時亦向英國提出派員赴英受訓，亦獲得英國同意。是年 7 月軍事委員會頒

佈〈赴英美參戰見習暨造船辦法〉，預備考選 100 名軍官參加同盟國海軍作戰與接受潛艇訓練暨造船工作，考選結果，前後兩批共錄取赴美赴英軍官各 50 名，於 1943 年和 1944 年先後離華。此外，又有國民政府依《租借法案》主動向美國政府提出「借艦參戰」，與向英國交涉，租借艦艇。英美兩國同意後，中國再次考選軍官和士兵約 2,000 人分赴美、英受訓，而原先商定租借之艦艇，美國改為全數贈予。

美、英贈予之軍艦和受訓之中國海軍官兵，是在戰後才駛返中國，並未趕上太平洋戰爭的作戰任務，反而立即投入了國共內戰。而海軍的領導權，則因戰後軍事委員會迅即解除陳紹寬海軍總司令職，而轉至陸軍出身的陳誠(1898-1965)、桂永清(1901-1954)手中，且由桂永清負主要職責。1946 年 7 月，美國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 1884-1972) 批准「512 法案」，規定美國得將海軍剩餘艦艇無償轉讓中國，其數量不得逾 271 艘，另派海軍顧問團來華，協助中國訓練海軍。1947 年 7 至 10 月，中國分四批接收了日本賠償艦艇共 34 艘。在戰後強敵日本海軍宣告解體，而美國又大力支持中國重建海軍的情況下，海權的論述，更有理由接續抗戰後期所發展出來的維護世界和平的角色。正如一篇報紙社論所期許的：「美國與中國為太平洋東西兩岸最重要的國家，今後太平洋安全的確保，主要將依賴於這兩大國間密切的合作。中國既為五強之一，除了關心自身的安全之外，對世界和平所負的責任，自亦應當仁不讓，勇敢的擔負起來。」³²

1946 年海軍出版了《新海軍月刊》，1947 年更名為《中國海軍月刊》，成為戰後海軍最主要的喉舌。在《新海軍月刊》的〈發刊詞〉中，就指出：

我們今天所要求的顯然絕不僅是國際地位的提高，而是永久的生存與解放，永久的幸福與自由獨立的中華民族不是國際條約所能賦予，而必以自力的鞏固的海防為其條件，這是歷史所證明的。我們要保持既得的勝利與國際的光榮，則必須澈底矯正以國際均勢來代替海防武力的錯誤思想……中國的將來是在海上，中國非變為現代的海權國不可！否則便不

足在這生存競爭的世界中佔有優勝的地位……今後中國要在國際上取得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毫無疑義的都得以具有海洋的資格為其條件。換言之，真正的獨立，是指中國在太平洋上獨立，真正的自由，是進出太平洋的自由，而真正的平等，是共享太平洋利益的平等……海洋是我們命運的象徵，是我們的生命線和國防線的所在，為了全民族的生存和安全計，為了維持太平洋上的永久和平計，我們要努力建立一個海權國家，而今後的國防理論的重心就應該注意到「中國新海軍的建設」。³³

在「新海軍」的概念下，維護海權和建設海軍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論述。首先是所謂的海防線問題，郭壽生在〈未來中國海防著重點在哪裡？〉一文中，將第一海防線定在敵國的海岸，與西方海權論者的觀念相同；第二海防線是西太平洋自東北、朝鮮，經琉球群島、臺灣、海南島到南洋群島，成一弧形；但若朝鮮不能獨立，琉球從屬問題未解決，則此一防線應北起山東半島，經舟山群島，再往臺灣延伸。在此防線中，臺灣為中鋒，朝鮮或山東半島為左翼，海南島為右翼。第三海防線則是以山西太原和廣西桂林做兩焦點，所畫出的的橢圓弧形，包括沿海七省的險要港灣、海口和島嶼。不同層次的海防線應有各自的建軍規劃重點³⁴。

建軍的責任落在總司令桂永清身上，他指出，「要謀中國海軍之獨立發展，絕不能經常仰賴盟國移讓與贈送的艦艇，及技術協助，我們必須由努力學習達到自力更生。」³⁵因此，建立海軍需要具有工業發達、財力富足、人才數用三個條件。工業發達，才能展開造艦計畫，故而要極力提倡科學，注意重工業；財力富足才能應付經費浩大的建設事業；而海軍任務特殊，學識也是特殊，因此人才極為重要。此外，良好的國際環境尤屬重要，在他看來，戰前的國防建設受到日本多方阻撓，戰後有了新的局面，盟邦「皆知中國擁有強大海軍實有裨益於世界和平，故目前國際局勢實為我建設海防之最佳機會。」³⁶

中國因抗戰勝利，得以提高國際地位，而使海軍對於掌握海權，有了更高的期望。但因國共內戰造成國內局勢惡化，海軍必

須投入戰場，原先設定維護世界和平的目標，最後只能流於空談。

六、結語

近代中國自 1860 年代起，因肆應帝國主義的入侵，開始重視海防。到了 1890 年代，馬漢的海權論述自美國傳至世界其他地方，中國也透過譯介而稍有接觸。本文考察晚清以來在建設海軍的過程中，中國對於海權的認識逐漸增長，由單純的海防考量，到 1930 年代的促進貿易振興經濟，以及護漁護僑。1940 年代隨著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在戰後的國際體系中被設定為維護世界和平的要角之一，此時海權的思考就包括了西太平洋區域。由此看來，海權的認識的調整，和國力的表現有關。

1950 年以後，遷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其海軍力量主要用於對抗中共的可能的入侵，以及有限度的護漁和護僑；而在國際冷戰局勢中，也擔負著西太平洋防止共產勢力擴張的責任。過去半個世紀，馬漢的海權論述並非有系統的引介，1954 年終於出現了一種由楊珍翻譯完成的《海軍戰略論》完整著作。³⁷此書曾在 1953 年由蔣中正審閱，令他「多得一重要學養，實為本年度學問之中心工作也」。是年 12 月 24 日他為此書作序，透露「余昔讀其日譯本，乃記為平生愛讀叢書之一」，認為「實為一般戰略之要義，不僅海軍將領，即陸、空各軍將領皆應熟習而師法之」。所以他囑咐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其昀(1990-1985)「從速付印，以饗我三軍將領崇慕馬漢將軍如饑渴者也，甚望我高級將領能深加研討，其於戰略學又將多一新啓示也。」³⁸至於海權論是否成為日後國軍戰略思考的重要指導之一，應可進一步探討。

註釋

- ¹ 皮明勇，〈海權論與清末海軍建設理論〉，《近代史研究》，1994.12，頁38；王榮國，〈嚴復海權思想初探〉，《廈門大學學報》，2004.3，頁41。
- ² 王榮國，〈嚴復海權思想初探〉，頁41-44。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楊士驥邀請嚴復至天津代為撰寫奏稿。
- ³ 皮明勇，〈海權論與清末海軍建設理論〉，頁38-39。
- ⁴ 〈海軍在世界歷史上之影響〉，《考察歐美海軍報告書》(未註出版時地)，頁2。
- ⁵ 周益鋒，〈「海權論」東漸及其影響〉，頁40；李金強，〈晚清十年海軍重建之籌議（1901-1911）〉，李金強、劉義章、麥勁生合編，《近代中國海防—軍事與經濟》(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1999)，頁240-241。
- ⁶ 皮明勇，〈海權論與清末海軍建設理論〉，頁39-42。
- ⁷ 李金強，〈晚清十年海軍重建之籌議（1901-1911）〉
- ⁸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民國前六年十月十七日祝民報紀元節在東京演講)〉，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年第三版)，頁479。
- ⁹ 〈瓊州改設行省理由書(1912年)〉，《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564。
- ¹⁰ 〈論孫中山的海洋觀〉，楊新華、時平，《中華海權與歷史文化》(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頁79。
- ¹¹ 〈戰後太平洋問題序(民國八年九月)〉，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頁748。
- ¹² 〈論孫中山的海洋觀〉，頁81-84。
- ¹³ 《申報》，1928年8月17日，頁2。
- ¹⁴ 張力，〈陳紹寬與民國海軍〉，《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頁225-226。
- ¹⁵ 〈民權與海軍之建設（1930年春）〉、〈「寧海」軍艦建造完成之經過情形〉，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

- ¹⁶ 1994），頁36、103。
- ¹⁷ 〈民權與海軍之建設（1930年春）〉、〈一年來海軍工作之實紀及訓政時期之規劃（1930年11月）〉、〈海政關係國防（1931年2月21日）〉、〈海軍與國防之關係（1936年6月）〉，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35、43、62、79。
- ¹⁸ 〈海軍有設部的必要（1928年12月）〉，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2-3。
- ¹⁹ 〈世界上有不要海軍的國家麼（1928年12月）〉，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3-4。
- ²⁰ 〈考察歐美海軍報告書〉(未註出版時地)，頁40。
- ²¹ 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編著，《近代中國海軍》(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頁903-904。
- ²² 皮明勇，〈抗日戰爭前後中國海軍學術述論〉，《軍事歷史研究》，1994.02，頁100。
- ²³ 皮明勇，〈抗日戰爭前後中國海軍學術述論〉，頁104-105。
- ²⁴ 皮明勇，〈抗日戰爭前後中國海軍學術述論〉，頁102。
- ²⁵ 張力，〈陳紹寬與民國海軍〉，頁230-231。
- ²⁶ 編者，〈一年來本刊的自我檢討〉，《海軍建設月刊》，第2卷第1期(1941年4月15日)，頁12。
- ²⁷ 郭壽生，〈我國海防建設著重點在那裡？〉，《海軍建設月刊》，第2卷第2期(1941年5月15日)，頁7、12。
- ²⁸ 老佛，〈中國的國防線是在那裡？〉，《海軍建設月刊》，第2卷第8期(1941年11月15日)，頁16-17。
- ²⁹ 〈海軍建設月刊海權專號徵文啟事〉，《海軍建設月刊》，第2卷第11號(1942年2月15日)，封底裡。
- ³⁰ 〈海軍建設（1943年11月23日）〉，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315。
- ³¹ 〈論中國海軍建設（1944年10月10日）〉，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頁342-343。
- ³² 〈中國的海權〉，《中央日報》，1946年2月7日，第二版。

- ³³ 〈發刊詞〉，《新海軍月刊》，第一卷創刊號（1946年），頁1-2。
- ³⁴ 郭壽生，〈未來中國海防著重點在那裡？〉，《新海軍月刊》，1946年第3期，頁18-20。
- ³⁵ 桂永清，〈中國海軍現狀〉，《中國海軍月刊》，1946年第4:5期，頁9。
- ³⁶ 郭壽生，〈恭讀桂代總司令論建設新海軍以後〉，《中國海軍月刊》，1947年第1期，頁5-6。
- ³⁷ 馬漢著，楊珍譯，《海軍戰略論》（台北：三軍大學，1955）。
- ³⁸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台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5），頁258。

引用書目

- 〈發刊詞〉。《新海軍月刊》。第一卷創刊號。1946。1-3。
- 《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 《考察歐美海軍報告書》（未註出版時地）。
- 《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台北：中正文教基金會，2005。
- 王榮國。〈嚴復海權思想初探〉。《廈門大學學報》，2004.3。40-48。
- 皮明勇。〈抗日戰爭前後中國海軍學術述論〉。《軍事歷史研究》。1994.2。100。
- 。〈海權論與清末海軍建設理論〉。《近代史研究》，1994.12，37-47。
- 老 佛。〈中國的國防線是在那裡？〉。《海軍建設月刊》。1941.11.15。2：8。16-17。
- 李金強。〈晚清十年海軍重建之籌議（1901-1911）〉。李金強、劉義章、麥勁生合編。《近代中國海防一軍事與經濟》。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1999。235-249。
- 周益鋒。〈「海權論」東漸及其影響〉。《史學月刊》。2006.6。38-44。
- 桂永清。〈中國海軍現狀〉。《中國海軍月刊》。1946。45。7-9。
- 海軍司令部《近代中國海軍》編輯部編著。《近代中國海軍》。北

- 京：海潮出版社，1994。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2。台北：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2005。
- 馬漢著。楊珍譯。《海軍戰略論》。台北：三軍大學，1955。
- 高曉星編。《陳紹寬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 張 力。〈陳紹寬與民國海軍〉。《史學的傳承：蔣永敬教授八秩榮慶論文集》。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1。215-238。
- 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年第三版。
- 郭壽生。〈我國海防建設著重點在那裡？〉。《海軍建設月刊》。1941.5.15。2：2。7-12。
- 郭壽生。〈未來中國海防著重點在那裡？〉。《新海軍月刊》。1946。3。18-20。
- 郭壽生。〈恭讀桂代總司令論建設新海軍以後〉。《中國海軍月刊》。1947。1。5-6。
- 楊新華、時平。《中華海權與歷史文化》。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
- 編者。〈一年來本刊的自我檢討〉。《海軍建設月刊》。1941.4.15。2：1。12。

海洋歷史文化
與
邊界政治

劉石吉、王儀君
主編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 / 劉石吉, 王儀君主編。
-- 初版 高雄市：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文學院，民101.08
面；公分。--(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部分內容為英文
ISBN 978-986-02-9628-0(平裝)

1. 人文社會學 2. 跨文化研究 3. 文集

541.207

100021513

人文社會研究叢書

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

發行人 王儀君
主編 劉石吉、王儀君
編輯助理 林佩璇、洪怡甄
出版者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地址 8042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電話 (07)5252000 轉 3241
傳真 (07)5250818
網址 <http://humanitiescenter.nsysu.edu.tw/>
發行日期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八月
定價 新台幣 300 元
展售處 國家書店
臺北市松江路 209 號 1 樓 / (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
臺中市中山路 6 號 / (04)2226-0330#20
高雄復文書局
高雄市蓮海路 70 號 / (07)525-0930
版次 初版
印刷 正友印刷有限公司

GPN 1010101232 · ISBN 978-986-02-9628-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序言

近代海洋研究的幾個重要議題是海洋史、海洋文化、海洋政治與海洋環境；海洋史的範圍除可縱觀人類生活、商業與交通，學者們還以區域及斷代方式，尋找海洋在不同時期之商業、政治及戰爭的定位。托本·瑞克(Torben C. Rick)所編輯出版之《人類早期對海洋環境之影響》(*Human Impact on Marine Ecosystem*)一書，相當發人深省；他認為，因為人口增加和地理擴張，船隻的建造、人口移居、捕獵和人們對海洋資源不夠重視的態度逐漸對海洋環境造成極大的影響。單就亞洲而言，西風東漸之時，歐洲對亞洲的物質需求和亞洲從貿易獲得利益，因此海洋所帶動物質文明的人士不僅涉及海盜、走私者，還有統治者和消費者。海洋傳送物質文明、傳遞消費習慣、運送避難者及尋找新家園的殖民者之時，卻造成一些土著民眾的浩劫。近代學者研究，眾所周知的阿茲特克人雖非均死於戰場或屠殺，卻因生態環境改變，死於疾病的甚多。至於亞洲地區葡萄牙人在摩鹿加群島所屠殺數千中國勞工，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國家遇難的事實卻是海洋交通發展史和文化跨越時的憾事。

雖然海洋有著不同的面貌，海洋文學傳遞的美感常與海洋所實際涉及的事物有一段距離，因此海洋研究成為近年最難以駕馭的學術領域之一。2008 年牛津大學出版的《海洋歷史百科全書》(*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涵蓋了埃及造船技術的文獻、維京人和海洋的關係以及世界歷史上與海洋相關的經濟、政治軍事及文化議題。國立中山大學人文中心也繼《海洋文化論集》、《海洋、跨界與族裔》、《城市與海洋論集》，再次邀請中研院劉石吉教授合編《海洋歷史文化與邊界政治》。本書篇章關於中國文學及歷史的論文計有六篇，關於西方文學、哲學及歷史的論文五篇。中國文學及歷史領域包括〈築城與拆城：論清代口岸城市成長與擴張模式〉、〈古代海洋文學中的長鯨形象〉、〈試論漢代文學中的海洋書寫〉、〈維安與捕盜：清代水師的職責〉、〈清